学术专论

清代献俘受俘礼初探

黄韶海

[摘要] 献俘礼制乃古代军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军队凯旋后将所获敌酋或首级进献庙、社及皇帝的礼仪活动。清朝前中期武功赫赫，圣祖、世宗、高宗三帝继承历代之制，将其不断得到发展完善，载入《会典》，并数度举行。道光八年，平定张格尔之乱，宣宗举行了有清—代最后一次献俘受俘礼，在档案中亦多有记载。献俘受俘礼，具有宣扬国威、震慑外藩的作用，既体现了清廷继承中华传统礼制，彰显王朝正统的政治意图，又见证了诸帝践行大一统事业的辉煌与艰辛。

[关键词] 清代　献俘受俘礼　军礼　边疆民族大一统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0）－03－0063－014

献俘礼制，其渊源可追溯至先秦。《礼记・王制》有云："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①] 这段话表明天子出征是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因此凯旋后要将获得的敌酋或首级进献宗庙，汇报战果，并在学宫举行祭祀。据高智群考证，周代已经形成了以报功、献俘、饮至、作乐、大赏等内容组成的宗庙献俘典礼。[②] 此项仪式，其实质是一种告祭礼，表达了对祖先和神灵的敬畏，故而献俘礼最初举行的地点往往是太庙、太社这类礼制性场所。唐朝始出现天子御宫城门楼受俘的形式，以凸显现世皇帝的权威。此后历经宋、明两代，斯典形成定制，祭告宗庙与门楼受俘并存，一般于同日内先后举行，统称"献俘礼"。[③] 至清代，则明确了在宗庙和门楼所行仪式上的区别：告祭庙、社者称"献俘"，帝御午门者称"受俘"，于相邻两日分别举行。这便形成了本文所言之"献俘受俘礼"。[④]

目前在学界，有关献俘礼制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先秦及唐宋时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

[收稿日期] 2019-04-26
[作者简介] 黄韶海（1994—），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1329465480@qq.com

① 阮元校刻，蒋鹏翔主编：《阮刻礼记注疏》卷12《王制》，《四部要籍选刊》影印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15页。按："馘"原指征战中割下的敌人左耳，后引申为敌人首级。

② 高智群：《献俘礼研究》，《文史》第35、36辑，中华书局，1992年。

③ 参见《宋史》卷121《礼二十四》，"受降献俘"，中华书局，1977年，第2836-2840页；《明史》卷57《礼十一》，"奏凯献俘"，中华书局，1974年，第1435-1436页。笔者查阅《元史》，发现元代并未制定献俘典礼。

④ 参见《清史稿》卷90《礼九》，"献俘受俘"，中华书局，1977年，第2664-2665页；《清朝通典》卷59《礼典军二》，"献俘"、"受俘"，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第1443页。

果，但是对于清代献俘受俘礼的演进，却缺乏足够关注。[①] 笔者以为，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作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事业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其在武力开拓边疆的过程中将“献俘”这种中原王朝军礼发扬光大，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与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鉴于此，本文以官书及相关档案资料为线索，力图考证清代六次献俘受俘礼的发展脉络，并探讨其背后的历史意义。

一、康雍时期献俘受俘礼的肇始与形成

清入关前后，战事频繁，俘获甚众，但由于戎马倥偬，未遑文治，故典礼多缺。康熙朝始修《会典》，与用兵有关的军礼仅有“命将出征仪”与“凯旋仪”两条目，[②]“其时献受犹无定制也”。[③] 然康熙二十年（1681），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国家重获统一，便有御史张集具题，指出“今逆璠（指吴世璠）之首已送京师，其逆党余孽，并皆擒获，耿逆（指耿精忠）又现在禁狱，海内莫不鼓舞称快”。值此举国同庆之际，他援引古制，请朝廷举行“天子御楼受俘，百官备位称贺”的“奏凯献俘之典”，以彰显皇帝“超越于千古”的“荡定之奇功”，[④] 但圣祖却并不允准。据《实录》记载，同年有臣子奏请皇帝上尊号，亦为圣祖批驳。他清醒地认识到，八年内战，“将士疲劳，生民困苦，疮痍未复，喘息未苏”，[⑤] 正当居安思危，励精图治，“恤兵养民，布宣德化”。[⑥] 虽然史料中并未对圣祖拒绝献俘典礼的原因进行解释，但笔者推断其考虑应与驳斥上尊号之议相同，即认为在天下初定的形势下倡行此类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举动实有害而无益。

九年后，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挑起战端，其势力不断东扩，侵犯喀尔喀，进入内蒙，逼临长城，严重威胁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圣祖分别于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两度亲征，经乌兰布通之役与昭莫多大捷，基本摧毁了噶尔丹的精锐主力。三十六年，圣祖决定第三次亲征朔漠，西渡黄河，至宁夏督军，噶尔丹陷于穷途末路，其部属纷纷倒戈。哈密回人头目额贝杜拉达尔汉白克便擒获了噶尔丹之子色布腾巴尔珠尔，押送肃州军前，由副都统阿南达遣护军校阿奇纳等解往皇帝驻跸的神木县献俘。三月初四日，行在君臣在御帐内举行了一个小型仪式：“一等侍卫、学士以上诸臣侍立，解俘将校引色布腾巴尔珠尔入，伏地不敢仰视。”[⑦] 皇帝问曰：“尔父噶尔丹穷困已极，降乎否耶？”色布腾巴尔珠尔答道：“臣稚子无知，想皇上天威自必降也。”至“问以他事，皆战栗不能对”。[⑧] 圣祖命令将其遣送京师，拘禁于理藩院，仍支给仓物，不久下谕赦而不诛。同年闰三月，噶尔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死于科布多阿察阿穆塔台

---

① 关于先秦及唐宋时期献俘礼制的研究成果，参见郭旭东：《甲骨卜辞所见的商代献捷献俘礼》，《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翟胜利：《西周金文与献俘礼》，《文物春秋》2010年第6期；高文文：《唐代献俘地略论》，《乾陵文化研究》2010年；邹贺：《宋代献俘礼渊源递变述考》，《延安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毕祥来：《唐代献俘礼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张红：《北宋献俘礼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关于清代献俘礼制的研究，参见柏桦：《午门献俘礼》，《紫禁城》2005年第3期；洪波、路伟、吴彭秀：《清朝乾隆时期战争的处置和降礼》，《社科纵横》2012年第7期。后两篇文章主要是介绍性质，未作深入探讨。

② 《大清五朝会典》（康熙朝）卷45《礼部六》，“命将出征仪”“凯旋仪”，线装书局影印本，2006年，第575-579页。

③ 《清史稿》卷90《礼九》，“献俘受俘”，第2664页。

④ 《山西道试监察御史张集为三藩乱平应行献俘大典事题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选辑：《平定三藩时期御史奏章》，《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按：此时告祭庙、社与门楼受俘的仪式仍被笼统的视为“献俘大典”，张集题请的实为举行受俘礼。

⑤ 《清圣祖实录》卷99，康熙二十年十二月戊戌。

⑥ 《清圣祖实录》卷99，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癸巳。

⑦ 嵇璜：《清朝通典》卷59《礼典军二》，“受俘”，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第1443页。

⑧ 《清圣祖实录》卷181，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乙卯。

地方，清军大功告蒇，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至康熙四十年，时过境迁，圣祖宽大为怀，释放了色布腾巴尔珠尔，授以一等侍卫，给之妻室。此事不录《会典》，而见载于《清朝通典》，将其记为清朝“受俘”之开端。

由上可知，康熙朝虽然未能形成献俘典礼的定制，但却在塞外出现了日后午门受俘仪的雏形，而圣祖“内地剿贼不献俘，惟外夷献俘”的做法，① 在某种程度上亦为后世帝王继承。因此，笔者认为康熙时期实为有清一代献俘受俘礼的肇始阶段。

至雍正时期，清朝举行了首次盛大的京师献俘典礼。二年（1724）二月，在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奋威将军岳钟琪的统领下，清军平定了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的叛乱，将青海地区纳入朝廷的直接管理。此战虽未能擒获首逆罗卜藏丹津，致使其逃往了准噶尔部，但俘虏了他的母亲、妹夫及叛军头目阿尔布坦温布、巴尔珠尔阿喇卜坦、吹拉克诺木齐、扎锡敦多布、藏巴扎布等人，可谓战果辉煌。为此，年羹尧上奏朝廷，指出：“（青海叛乱）名义上以罗卜藏丹津为首行，而罗卜藏丹津乃一嗜昏人，虽原有此心，亦不能独行，俱系吹喇（拉）克诺木齐、阿喇布坦鄂木布（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此三人为首授意罗卜藏丹津，施计而行，此全青海皆稔知，确系另类为首贼匪。”故而年羹尧派遣旗官 1 员、兵 20 名、绿旗官 1 员、兵 10 名，于四月初四日自西宁启程，将这 3 名青海叛乱的头目槛送兵部，建议皇帝“于京师正法，外藩诸部蒙古人闻之，均可知惧”。其余俘囚则由年羹尧带往会盟处，审明详实，将情罪重大者斩首示众，如此则“嗣后众蒙古人惧天威，且亦明国法”。② 一言以蔽之，便是诛戮叛逆，以儆效尤。

世宗十分赞同年羹尧的主张，为了宣扬国威，震慑藩服，并告成先祖，他于四月十四日命廷臣查考古制，详议“告祭太庙献俘之典”。二十日，总理事务和硕裕亲王保泰领衔上奏，认为“唐、宋、明献俘受俘之仪，先遣官献于太庙，次献太社，次御门楼宣露布受俘，三礼相因而行”，朝廷制定斯典可在该制度的基础上斟酌损益：其一，告祭庙、社与帝御午门的仪式应于前后两日分别举行；其二，古者门楼受俘有宣读露布的程序，向天下告捷，用以彰显敌酋罪恶，展示朝廷用兵的威德。但是此次凯旋，大将军年羹尧“屡次奏捷，本章已颁布天下，无容再宣”，这一步骤可不予施行。③ 然而，世宗却并不允准，他认为平定青海乃圣祖“留贻之功”，故捷音到日便恭告景陵。此次年羹尧解俘来京，诏命议行献庙礼，亦是为了告慰先帝在天之灵。但是诸王大臣却奏请午门受俘，将平叛之功归于皇帝，这令世宗受之有愧。因此他命群臣再议，“可否只行献俘不行受俘之礼”。④ 翌日，保泰等再度联名上奏，称其查明历代典制，发现“古有受俘不献俘者，未有献庙而不受俘者”。另外，他们认为“圣祖皇帝所垂大烈我皇上成之”，故世宗完全能够承担得起青海之功而无需顾忌。因此，群臣仍恳请皇帝依照古制，“于献俘太庙、社稷坛之后行受俘之礼”。⑤ 无论世宗是否仅仅为了展现谦逊的姿态，经过一番波折，他最终同

①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 20《王文僖公事略》，岳麓书社，1991 年，第 602 页。

② 《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将贼首解至京城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黄山书社，1998 年，第 749-750 页。

③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西陲大捷请依古典行献俘受俘之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848-849 页。关于“露布”这一文书形式的演变及作用，参见徐燕斌、袁丽华：《历代露布考》，《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 年第 2 期。

④ 《清世宗实录》卷 18，雍正二年四月癸亥。按：圣祖晚年联合青海蒙古进行驱准保藏之役，藉此封赏诸台吉，分化和硕特势力，达到“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效果，为雍正年间彻底解决青海问题奠定了基础。故世宗认为平定青海乃“圣祖留贻之功”。

⑤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献俘庙坛后行受俘之礼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 册，第 852 页。按：折中提到“古有受俘不献俘者，未有献庙而不受俘者”，指的是唐代出现“门楼受俘”形式以后的礼制。保泰等列举了唐代玄宗朝生擒西域石国王以及宪宗朝拿获节度使刘辟、吴元济的例子加以证明，称“史书止载受俘而无献庙之文”。

意了保泰等诸王大臣的建议。待到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三人解送进京，有清第一次举行献俘受俘礼，成该礼之滥觞。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十日，献俘礼在京师举行，具体步骤史载如下：

> 兵部率解俘官员兵丁，押所解之俘，白练系颈，由长安右门入，进天安门西门，至太庙街门外，向北立。候告祭大臣至，俘向北跪，告祭大臣进太庙街门之北门，由砖城西门，至戟门之西门入。陪祀文武官员东西班先集，告祭大臣就行礼位，行礼如时享仪，陪祀官随行礼。礼毕，兵部率解俘官员兵丁押俘至社稷街门外，向北立。候告祭大臣至，俘向北跪，告祭大臣进社稷街门之南门，由南天门进，陪祀文武官员，分东西班先集，告祭大臣就行礼位，行礼如春秋祭仪，陪祀官随行礼。礼毕，告祭大臣、陪祀官以次出，兵部率解俘官员兵丁，押俘仍由天安门西门，长安右门出，百官各退。[①]

闰四月十三日[②]，世宗登临午门楼受俘，典礼盛况见诸《实录》：

> 王以下文武百官齐集午门前，设卤簿，鸣金鼓。上御午门楼前楹，升宝座，受俘。兵部官率解俘将校，将平定青海所获叛逆俘囚，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三人，白练系颈，跪伏。兵部堂官奏："所获俘囚，谨献。"上命交刑部。于是刑部官领旨，兵部官引俘押出。王以下文武各官行礼毕，上回宫。是日，赐解俘各官蟒缎、朝衣、靴帽，加赏银百两，兵丁各赏银二十两。[③]

仪式结束后，俘囚被押往刑部，按照明代典制，"付刑官"意味着当"就刑"。[④] 世宗继承了这一做法，正如年羹尧建议，吹拉克诺木齐等三人"悉伏诛"。[⑤]

雍正十年，续纂《大清会典》告成，按"献俘仪""受俘仪"的条目将斯典载入"军礼"。[⑥] 这标志着清朝献俘受俘礼基本形成定制，亦为后世帝王继承遵循。正如《清史稿》所言："自是平定藩部，献俘以为常"，[⑦]"凡平定疆宇，受俘仪并同"。[⑧]

二、乾隆时期献俘受俘礼的发展与兴盛

乾隆时期，高宗开创"十全武功"，开疆拓土，国势日强。在频繁的军事战争中，献俘受俘礼屡屡举行，获得了重要发展，臻于兴盛。

乾隆十二年（1747），由于地处川西的大金川土司首领莎罗奔及其侄郎卡恃强凌弱，不断侵犯小金川等邻近土司，杀伤番民，抢掠财物，甚而抗命朝廷，攻击官军，导致地方不靖，边圉不宁。为此，高宗决策出兵进剿，务要扫灭金川，以绝后患。战争之初，他满怀信心，要求前线将领将"莎罗奔必须生擒献俘"。[⑨] 其后战况不佳，他又指出："如能生擒莎罗奔及郎卡献俘，固为大快。即或逆酋自知不免，先伏冥诛，或窜伏他部，而我兵能捣其巢穴，夺踞勒乌围、刮

---

① 《大清五朝会典》（雍正朝）卷 63《礼部七》，"献俘仪"，第 1016 页。

② 此次午门受俘实为献俘礼后"越三日"举行。（《清世宗实录》卷 19，雍正二年闰四月癸未、闰四月丙戌；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14，雍正二年闰四月癸未、闰四月丙戌，清方略馆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编辑室整理：《清代方略全书》第 21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年，第 430-432 页。）则《会典》所述"雍正二年，平定青海，于献俘次日，行受俘礼"显误。（《大清五朝会典》（雍正朝）卷 63《礼部七》，"受俘仪"，第 1017 页。）然而，《会典》之记载却成为了日后朝廷举行献俘受俘礼所遵循的成例。

③ 《清世宗实录》卷 19，雍正二年闰四月丙戌。

④ 《明史》卷 57《礼十一》，"奏凯献俘"，第 1435 页。

⑤ 祁韵士著，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卷 11《厄鲁特要略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174 页。

⑥ 《大清五朝会典》（雍正朝）卷 63《礼部七》，"献俘仪""受俘仪"，第 1016-1017 页。

⑦ 《清史稿》卷 83《礼二》，"社稷之祀"，第 2516 页。

⑧ 《清史稿》卷 90《礼九》，"献俘受俘"，第 2665 页。

⑨ 《清高宗实录》卷 321，乾隆十三年闰七月丁丑。

耳崖，或擒获伊用事头人，即当奏捷献俘。如青海之罗卜藏丹津，未能就擒，亦即将所获头人献俘，具有成例。”[①] 然而，金川虽则偏处一隅，“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满三万众”，[②] 但是其地处高寒，气候恶劣，山高谷深，形势险峻，土司军民又遍筑碉楼，易守难攻。因此高宗虽连换张广泗、讷亲、傅恒三位统帅，动用军士“六万二千五百余员名”，耗饷“七百六十万四千八百余两”，[③] 却损兵折将，师久无功。最终，乾隆十四年二月，清军以接受莎罗奔投降，阵前赦免，仍为土司如故的方式草草了结了这次战争，高宗“京师献俘，明正典刑”的愿望落空。[④] 然而，借此契机，清廷完善了雍正年间制定的献俘受俘礼。战后，傅恒率师回京，朝廷定经略大将军仪注，后来载入嘉庆、光绪续修《会典》，成为“命将出师，则颁其仪”的军礼十二条。[⑤] 其中“受降”一条，根据傅恒接受莎罗奔投降的仪式制定，要求“凡经略大将军受降，飞章入告，得旨允降，乃大书露布，传示中外”。[⑥] 而“献俘”一条则强调，“凡出师克捷，应照雍正二年平定青海，以俘献于庙、社如仪，献俘次日行受俘礼，均如雍正二年之仪。有赦而不杀者，奉旨释缚，交理藩院”。[⑦] 既从制度上正式将“露布天下”的程序由古时的“门楼受俘”移入“大将受降”，明确了献俘受俘礼的定制，又规定了赦免俘囚的方案，从而使斯典进一步系统化。

自乾隆二十年至四十一年，清朝进入开拓边疆的重要时期，先后平定准噶尔、回疆、大小金川，高宗四次举行献俘受俘礼，规模空前，充分彰显了盛世气象。

（一）乾隆二十年平准之役两行献俘受俘礼

乾隆二十年二月，高宗利用准噶尔部内乱不止，首领达瓦齐昏庸无能，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以及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纷纷率众归顺朝廷，厄鲁特蒙古濒于分崩离析的有利形势，派遣两路大军，用兵西北。清军进展迅速，一路上招降纳叛，五月会合于伊犁附近的博罗塔拉。达瓦齐众叛亲离，弃城出走，又遭格登山之败，率残部远遁。在清军征讨的过程中，擒获了先降后叛的杜尔伯特部头目孟克特穆尔、车凌孟克之子巴郎以及雍正年间逃匿准噶尔部的罗卜藏丹津。[⑧] 定北将军班第派遣侍卫台布、喀尔喀协理台吉图巴扎布、宰桑乌勒木济等将他们沿途槛送。高宗命乾清门侍卫前往张家口交接，押解俘囚进京。[⑨] 六月，罗卜藏丹津、孟克特穆尔、巴郎被监送至京师，行献俘受俘礼。

六月十七日，在太庙、社稷坛举行献俘礼，其流程与雍正二年相同。翌日，高宗御午门楼受俘，当兵部堂官以解到俘囚请旨时，皇帝下谕：“命刑部将巴郎、孟克特穆尔即行正法，罗卜藏丹津交军机大臣等审讯。”[⑩] 于是刑部堂官领旨，押俘出天安右门，王公百官跪叩庆贺，高宗回宫，典礼结束。

期间，高宗对三名俘囚采取了不同的处置方式。巴郎、孟克特穆尔“背恩脱逃”皇帝认为

---

① 《清高宗实录》卷 328，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壬戌。

② 王先谦：《正续东华录》（乾隆朝）卷 83，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己巳，撷华书局，光绪丁亥（1887）年印，第 36 页。

③ 郑栖山编纂，张羽新校注：《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 2 辑，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1 年，第 4 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 305，乾隆十二年十二月甲申。

⑤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 339，乾隆十四年四月丙午。“经略大将军仪注”包括“授敕印、祓社、祖道、整旅、守土官相见、封章拜诏、升帐接属、简阅、献俘、受降、告成、劳师”十二则；又见《大清五朝会典》（嘉庆朝）卷 21《礼部三》，第 245-247 页。《大清五朝会典》（光绪朝）卷 28《礼部三》，第 230-232 页。“军礼十二条”为“授敕印、祓社、祖道、整旅、过境、封章拜诏、升帐接属、简阅、受降、奏凯、劳师、受俘”。二者条目虽略有区别，然内容基本一致。

⑥ 《清高宗实录》卷 339，乾隆十四年四月丙午。

⑦ 嵇璜：《清朝通志》卷 44《礼略九》，“献俘受俘”，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0 年，第 7011 页。

⑧ 孟克特穆尔、巴郎原系乾隆十九年随杜尔伯特部台吉三车凌归顺降清，然不久却又率属人叛逃边外。参见《清高宗实录》卷 467，乾隆十九年六月戊辰；卷 467，乾隆十九年六月丙子。

⑨ 《清高宗实录》卷 489，乾隆二十年五月辛卯、五月戊戌。

⑩ 《清高宗实录》卷 491，乾隆二十年六月庚申。

他们“情罪甚重，国法难宽”，[①] 故处以极刑。罗卜藏丹津则系雍正年间青海叛乱逆首，已历三十余年，时过境迁，其影响力不复存在，且世宗生前曾谕示倘若擒获，当不加诛戮，仍“施恩豢养”。[②] 因此高宗于六月二十日下谕军机大臣，赦免了罗卜藏丹津，并赏给房屋一所，令居京师。其二子则编入蒙古正黄旗，分授蓝翎侍卫，另给妻室，备加怀柔。

在京师筹备献俘受俘礼的同时，高宗严令前线将帅追捕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至六月初八日，回人头目霍集斯擒获逃入南疆的达瓦齐及其子罗布扎等 70 人，押赴清营。二十五日，定边将军班第即派参赞大臣哈达哈、厄鲁特台吉根敦扎卜、喀尔喀贝勒那木扎尔隆率兵 500 名槛送达瓦齐父子，其余人等分批押解。[③] 高宗殷切期待俘囚进京，举行盛典，告成天下，因此推迟了往年木兰秋狝的时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记录如下：

> abkai wehiyehe i orici aniya nadan biyai ice duin de hese wasimbuhangge.mini beye ere biyai juwan ninggun de jurafi halh ū n be jailara gurung de genembi seme hese wasimbuha bihe. te dawaci be jafame bahafi olji alibumbi,dawaci orin deri uthai gemun hecen de isinjici ojoro be dahame,juwan ninggun de jurara be nakaha,dawaci be olji alibure dorolon yabubuha amala jurambi sehe.[④]
>
> [译文] 乾隆二十年七月初四日奉上谕：朕躬曾降旨于本月十六日启程前往热河行宫。今达瓦齐擒获献俘，下旬即可到京，著停止十六日动身，俟达瓦齐献俘礼后启程。钦此。

然而，由于道路遥远，解俘进京误了期限。高宗改变计划，决定于八月初六日先赴热河举行木兰秋狝，召见征准归降蒙古诸台吉，遂命副都统鄂实带领达瓦齐等暂居张家口外，待回銮后再行献俘受俘礼。[⑤] 十月初八日，高宗回京。十七日，朝廷遴选俘囚内情罪重大之达瓦齐、罗布扎、莽喀、图巴、敦多克、和通等，举行献俘礼。翌日，天子御午门楼受俘。兵部堂官跪奏请旨，皇帝下谕：“达瓦齐等著免交刑部，俱交理藩院。”[⑥] 这是按照乾隆十四年完善后的典制给予办理，意为当场释缚。正如高宗所言：“例应兵部奏献俘囚后，付刑部行刑，以赦达瓦齐死故，只令付理藩院安置。”[⑦] 理藩院堂官领旨，押俘出天安右门。

由于当时原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已经在伊犁重举叛旗，西陲狼烟又起，故而高宗为了分化瓦解厄鲁特蒙古势力，鉴于达瓦齐执政期间并未公开悖逆清廷，决定对其宽大为怀，广视怀柔。十一月，皇帝封达瓦齐为亲王，赐第京师，其子罗布扎亦封公爵，极尽优容。

高宗平定准噶尔，完成了康、雍二帝未竟之业，消灭了数十年来困扰朝廷的边患大敌，是清朝致力大一统的重要实践。斯年，清军捷报频传，皇帝两行献俘受俘礼，一时传为佳话。此外，通过审视高宗对待俘囚的不同处置方式，亦可见清帝统御边疆刚柔并济、恩威并施的政治手腕。

（二）乾隆二十五年平定回疆再行献俘受俘礼

乾隆二十二年，清军再平准部，彻底消灭了厄鲁特蒙古势力，底定北疆。然叛乱头目阿睦尔撒纳逃往俄罗斯，死于其地，清军未获首逆，高宗深以为憾，遂不行告庙受贺、献俘受俘等庆典活动。翌年，清军马不停蹄，挥师南下，征讨回疆回人首领、伊斯兰教白山派领袖大小和

---

① 《清高宗实录》卷 489，乾隆二十年五月戊戌，乾隆二十年五月辛卯。

② 《清世宗实录》卷 64，雍正五年十二月甲午。

③ 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 15，乾隆二十年七月乙酉，《清代方略全书》第 23 册，第 553 页。

④ 《为达瓦齐抵京行献俘礼后启程赴避暑山庄事》，《上谕档》，乾隆二十年七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18-009-000014-0001。

⑤ 《清高宗实录》卷 494，乾隆二十年八月乙巳；卷 495，乾隆二十年八月己未。

⑥ 《清高宗实录》卷 499，乾隆二十年十月戊午。

⑦ 弘历：《又御制定北将军班第遣人解达瓦齐至御午门受俘诗》，于敏中等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卷 10《国朝宫室》，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144 页。

卓布拉尼敦、霍集占兄弟发动的叛乱。经库车之役、黑水之围、呼尔璊之战，清军扭转了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沉重打击叛军。二十四年夏，清军经休整后再度进攻，大小和卓慑于兵威，分别放弃据点喀什噶尔、叶尔羌，向西远遁。高宗基于稳定回疆，根除后患的考虑，要求前线将领务必擒获首逆兄弟，尤其是叛乱主谋小和卓霍集占，“惟生得霍集占，明正其罪，方可竣事”。① 清军遂穷追不舍，与回兵在帕米尔高原遭遇，经霍斯库岭、阿尔楚、伊西洱库尔淖尔三场鏖战，大败叛军，两和卓仅带三四百人逃往巴达克山。清军统帅、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奉高宗之命，遣使往巴达克山索俘，并以军事进攻相威胁。该部首领素勒坦沙原想庇护同教之人，然怵于兵威，不得不向清廷奏报已枪毙霍集占，生擒布拉尼敦，并于九月献出霍集占首级，而布拉尼敦则下落不明。② 高宗鉴于布拉尼敦系霍集占怂恿作乱，且有投诚意向，可置之不问，遂宣示天下，大功告蒇。富德派遣乾清门二等侍卫噶毕雅图巴图鲁额勒登额将霍集占首级及其部属、守尸人扪多索丕等解送进京。③

待额勒登额一行抵京后，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日，朝廷举行献俘礼，告祭太庙、社稷坛。翌日，高宗御午门楼受俘，命“悬霍集占首级于通衢，宥俘囚扪多索丕等”。④ 此次依古制，生俘与死馘并献，从而丰富了清代献俘受俘礼的形式。

自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经平准平回之役，清朝统一了天山南北，“拓疆二万余里”，⑤ 成为“十全武功”中最为彪炳史册的一页。五年之内，三行献俘受俘礼，见证了清朝的武功赫赫，边疆一统，“时论称极盛”。⑥

（三）乾隆四十一年平定金川复行献俘受俘礼

乾隆十四年第一次金川之役后，由于清军未获全胜，草率了事，因此川西土司地区的局势并未有明显改观，大金川仍横行无忌，甚至与小金川由对抗走向了联合，共同兼并蚕食邻近土司，致使地方长期不宁，严重削弱了朝廷权威。因此，三十六年十月，高宗决定再征金川。战争初期，清军进展顺利，于翌年底平定小金川全境，首领泽旺投降，旋处死，其子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三十八年，清军进攻大金川，屯驻木果木地方。大金川首领索诺木煽动已降清的小金川土官，包抄清军后路，偷袭其营寨，造成清军惨败，主帅温福被杀，士卒死亡 4000 余人，各碉寨守兵闻风溃逃，小金川之地得而复失。高宗闻讯大惊，遂任命能征善战的阿桂为定西将军，并调兵筹饷，以图再举。经过一番休整，清军于十一月重新平定小金川，并于次年向大金川再度发起进攻。此地形势险要，碉寨林立，清军历经艰辛，与敌周旋，至七月推进到大金川的重要据点逊克尔宗。索诺木惊慌失措，设计诱杀小金川的僧格桑，于八月遣使将僧格桑尸及其妻妾、属人送到清营乞降，求朝廷宽宥。阿桂奉高宗之命予以拒绝，誓要擒拿首逆，永绝后患。他遵旨拘禁了献尸人等，并割下僧格桑首级暂存成都，待日后一并献俘。清军逐碉攻坚，奋勇鏖战，至四十年攻克大金川的中心官寨勒乌围，索诺木仓皇逃至噶拉依。清军移师往攻，严密包围噶拉依。十二月，索诺木之母亲、姑姑及兄长莎罗奔冈达克等人先后出降。翌年二月初四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索诺木率领其兄弟、妻子、大小头目、喇嘛及男女老少 2000 余人出寨投降。至此，历时近五年，用兵“一十二万九千五百余员名”，耗饷“六千一百六十万两”⑦ 的第二次金川之役以清军的胜利而

① 《清高宗实录》卷 591，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丙午。

② 关于布拉尼敦的下落，众说纷纭。既有被杀说，又有逃亡说，复有尸体被盗说，总之清军未获其人或尸身。参见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06 页。

③ 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 81，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庚子，《清代方略全书》第 26 册，第 424 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 604，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丁巳。

⑤ 王先谦：《正续东华录》（乾隆朝）卷 83，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己巳。

⑥ 《清史稿》卷 90《礼九》，“献俘受俘”，第 2665 页。

⑦ 郑栖山编纂，张羽新校注：《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 2 辑，第 5 页。

告终。

战后，阿桂遣内大臣、户部侍郎福康安督率火器营翼长讷音并健锐营、火器营官兵 100 名于二月初六日启程，押解索诺木与其兄莎罗奔冈达克、索诺木彭楚克、甲尔瓦沃杂尔及助恶大头目进京，至成都随同函送小金川僧格桑首级，其余 250 余人则分批解送。[①] 待福康安一行人抵达京师，朝廷于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太庙、社稷坛举行献俘礼，俘囚甚多，逆馘并献，规模宏大：

> 兵部率解俘将校，押俘酋索诺木、莎罗奔冈达克、索诺木彭楚克、甲尔瓦沃杂尔，逆目山塔尔萨木坦、布笼普占巴、雅玛朋、阿库鲁，并逆酋僧格桑馘函，由长安右门入，进天安右门，至太庙街门外，向北立。候告祭大臣至，押俘向北跪，置僧格桑馘函于地。告祭大臣进太庙，行礼毕，兵部率解俘将校，押俘至社稷街门外。押俘仍向北跪，告祭行礼如前仪。[②]

其时正值高宗东巡回銮，于四月二十六日驻跸黄新庄行宫，在此迎接率师回京的阿桂等人。次日，皇帝赴良乡城南，举行郊劳之礼，慰问赏赐凯旋将士，随后一同入京。故与往常不同，此次午门受俘仪延迟至献俘礼后的第三天，即四月二十八日举行。

依照成例，受俘之日，侍郎福康安率解俘将校，押俘囚索诺木等于午门前北向跪伏，置僧格桑馘函于地。兵部堂官跪奏："平定两金川，生擒逆酋索诺木等，并获逆酋僧格桑首级，谨献阙下。"[③] 高宗诏命交刑部，刑部官跪领旨，押俘自天安右门出。王公百官行庆贺礼。

然而，礼成之后，高宗增加了御审俘囚的环节。他临御瀛台，亲鞫索诺木等罪状，命刑部将索诺木、莎罗奔冈达克、索诺木彭楚克、甲尔瓦沃杂尔、山塔尔萨木坦皆寸磔处死，枭索诺木首，与僧格桑首级并悬市通衢。[④] 由于平定大小金川使清朝损失惨重，成为"十全武功"中耗时最长，用银颇巨，折损人马最多的一场战役，因而高宗对这批俘囚尤其痛恨，处置极为严酷，毫不留情。御审定谳的方式，充分彰显了皇帝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对叛乱者更具震慑力，遂为之后宣宗所继承。

清廷彻底平定大小金川，在当地设置流官，驻兵兴屯，从而加强了中央的管辖，保障了西南地区的稳定，有力推动了雍正朝以来所践行的改土归流的历史进程，亦可称高宗执政期间的重要武功之一。战争结束后，高宗第四次举行献俘受俘礼，他登临午门城楼之时，感慨万千，不禁吟诗道："陈仪凯献声灵赫，偃武欢腾礼乐彬。四沐天恩际时泰，盈虚默念倍惶寅。"[⑤] 此时的大清正值鼎盛，"四征不庭，揆文奋武"。[⑥] 然而，正如高宗所担忧的那样，盈虚有数，盛极必衰，随着乾隆以后清朝的衰落，献俘受俘礼亦不复当年的荣光。

三、道光时期献俘受俘礼的重举与终结

自乾隆四十一年以后半个世纪，边疆地区相对稳定，朝廷没有取得新的重大胜利，[⑦] 故而未行献俘受俘礼，直至道光八年（1828）因平定回疆张格尔叛乱方才重举斯典，遂成有清一代之绝响。张格尔系乾隆年间回疆叛乱首领大和卓布拉尼敦之孙，随其父萨木萨克在中亚浩罕国流亡，时刻希冀恢复祖业。他利用南疆官员、回部伯克贪虐不法，丧失民心以及白山派一些教

---

① 阿桂等：《平定两金川方略》卷 133，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己未，《清代方略全书》第 20 册，第 124-125 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 1007，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丙寅。

③④ 《清高宗实录》卷 1007，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己巳。

⑤ 弘历：《乾隆四十一年御制金川平定御午门受俘即事成什》，于敏中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卷 10《国朝宫室》，第 145 页。

⑥ 《清史稿》卷 15《高宗本纪六》，第 565 页。

⑦ 乾隆五十七年征讨廓尔喀之役，高宗曾想俟福康安擒获渠魁后再行献俘受俘礼，然由于清军在帕郎古失利，此战以双方议和，廓尔喀请降而告终，未能如愿。参见《清高宗实录》卷 1417，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壬子。

徒长期仇视清廷的有利形势，煽动叛乱，分别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道光四年两次率众扰边，并于道光六年六月，联合浩罕国，纠集安集延、布鲁特两部500余人，突入南疆。白山派教徒与遭受压迫的回部民众纷纷响应，其势力迅速发展，拥众数万，至八月连下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西四城，清军损失惨重，领队大臣乌凌阿、穆克登布、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皆阵亡。张格尔自称苏丹，建立政权，野心勃勃，妄图染指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东四城，统一天山南路全境。在危急关头，宣宗任命长龄为扬威将军，杨遇春、武隆阿为参赞大臣，赴阿克苏统兵平叛。经柯尔枰之战，清军取得大捷，有效阻遏了叛乱东进的势头。翌年二月，清军展开反攻，由于张格尔统治期间，其暴虐程度较之南疆官吏更甚，因此回部民众纷纷转而支持朝廷。清军进展顺利，经洋阿尔巴特、沙布都尔、阿克瓦巴特等战役，击溃叛军主力，攻克喀什噶尔城，张格尔被迫逃往境外。至四月，清军连克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西四城全部收复。十二月，张格尔欲乘年关防守松懈之机再度入边袭扰，却遭清将杨芳穷追。二十九日，逃至喀尔铁盖山，其部几遭全歼，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格尔为清军生擒俘虏。

早在清军克复喀什噶尔之前，宣宗曾传谕前线将领："如张逆刻已成擒，即著遴派干练文武大员，妥速解京。倘竟临阵歼毙，亦即割取首级，函送献馘。"[①] 因此，追获逆酋后，道光八年正月初六日，长龄便派遣副都御史诚端、副都统吉勒通阿、副都统衔头等侍卫祥云保率领官兵2000余名，由喀什噶尔出发，解送张格尔进京献俘。[②] 关于此次献俘受俘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较为完整的原始记录，笔者以其为核心文本，结合官书记载，力图勾勒解俘、献俘受俘、颁赏、亲鞫定谳的全过程，一窥军礼盛典的隆重风貌。

诚端一行启程后，经阿克苏、库车、吐鲁番等地，途中遇到奉旨前来会同解俘的都统哈朗阿，遂共同押送，至三月初九日入嘉峪关。[③] 一行人继续前进，过甘肃、陕西、河南、直隶等省区，沿途亦有新的成员加入，[④]"经一万数千里之遥，轮流伴送，昼夜辛勤，防范周密，劳绩备著"，[⑤] 于五月初五日行至保定。兵部派遣郎中恩龄、员外郎恒昌驰驿前往提迎俘囚，并随解俘官兵一同进京。五月初十日，就在献俘礼举行的前一天，哈朗阿等如期抵达京师，俘囚张格尔则被解交兵部武库司收管。[⑥] 据记载，行程中地方督抚大臣皆承办供支，善加照料，"先期遴委镇、道大员，并分饬沿途地方文武员弁，一体妥为护送"。譬如护理陕西巡抚徐炘派遣西安镇总兵得志、督粮道尹佩珩自四月初三日解俘将校由甘肃进入陕西境内，便一直带领营汛官兵勤慎出力，小心迎护，直至十五日哈朗阿一行人出境赴河南。[⑦] 正是他们共同努力，管束妥协，防范周密，使沿途未生波折，张格尔亦"极为安静"，[⑧] 顺利抵达京师。值得一提的，从喀什噶尔随同解俘的

---

① 《清宣宗实录》卷116，道光七年四月戊申。

② 曹振镛等：《平定回疆剿捦逆裔方略》卷57，道光八年正月壬戌，《清代方略全书》第100册，第479页。

③ 都统哈朗阿：《奏报遵旨计程押解首逆张格尔到京日期并行抵陕省安静情形事》，《宫中朱批奏折》，道光八年四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0700-029。

④ 譬如署理陕甘总督鄂山便派遣署督标中军副将窦德、平凉府盐茶同知陈士桢随同哈朗阿一行解俘进京。参见都统哈朗阿：《奏报遵旨计程押解首逆张格尔到京日期并行抵陕省安静情形事》，《宫中朱批奏折》，道光八年四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0700-029。

⑤ 曹振镛等：《平定回疆剿捦逆裔方略》卷64，道光八年五月甲寅，《清代方略全书》第101册，第61页。

⑥ 参赞大臣哈朗阿：《奏报接晤兵部迎提俘囚司员并押解首逆张格尔行抵保定各日期事》，《宫中朱批奏折》，道光八年五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6-0132-085。

⑦ 护理陕西巡抚徐炘：《奏报护解首逆张格尔过境日期事》，《宫中朱批奏折》，道光八年四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0700-020。

⑧ 护理陕西巡抚徐炘：《奏报护解首逆张格尔过境日期事》，《宫中朱批奏折》，道光八年四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0700-020。

还有 10 余名回部伯克及“闲散回子”，他们进京后，被安置于理藩院居住，等待参加典礼。①

正当哈朗阿等解送俘囚之时，京城亦在有条不紊地筹备献俘受俘礼。三月三十日，经钦天监择吉，定于五月十一日行献俘仪，十二日行受俘仪，② 各衙门便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前期工作：内务府负责修理午门楼殿内陈设，糊饰整齐楼座及门窗，预备赏赐解俘官兵银币；步军统领衙门负责派兵打扫午门以外地面；③ 两翼前锋统领、八旗护军统领处负责详查受俘礼办差人员，咨行各衙门造具花名册，严格是日午门出入；④ 礼部负责查考会典旧例，制定典礼流程，刊刷仪注，通行在京各衙门一体遵照。⑤ 五月十一日，行告祭庙、社献俘礼，其仪式相对简单，此不赘言。同日，礼部行文相关衙门执事官员，于午门前齐集，将仪仗乐器全行陈设，按照仪注演习受俘礼，“以昭慎重”。⑥ 至此，一切准备就绪。五月十二日，盛典如期举行，分为“进俘”“受俘”“齐班”三项流程。

是日清晨，工部官设黄幄御座于午门楼正中，武备院、銮仪卫、乐部和声署陈设黄盖、法驾卤簿以及丹陛大乐、金鼓铙歌。内大臣率侍卫着蟒袍补服，立两观翼楼阶上，护军统领率护军立阶下，均佩刀环卫。兵部堂官、刑部堂官、承旨大臣、鸿胪寺官、銮仪卫官、鸣赞官等皆于指定位置就位，诸王以下文武百官身着朝服，按翼序立，兵部司官率解俘将校，押逆酋张格尔，白练系颈，由长安右门至天安右门入。宣宗在礼部堂官的引导下，着龙袍衮服，乘舆出宫，在金鼓铙歌声中登临午门城楼，御黄幄前。伴随着皇帝升座，乐止，銮仪卫官传鸣鞭校尉三鸣鞭，鸣赞赞“进俘”，典礼的第一项流程正式开始。丹陛大乐作，奏庆平之章，鸿胪寺官引解俘将校、伯克、“闲散回子”入，行三跪九叩礼，乐止，将校等退；鸣赞赞“受俘”，开始了第二项流程。兵部司官率将校押俘至，北向跪匍匐。兵部尚书趋至午门楼前跪奏请旨：“平定回疆，生获俘囚张格尔，谨献阙下。”承旨大臣传宣宗之命，鸿胪寺官接宣曰：“所献俘，交刑部。”刑部尚书遂上前跪受领旨，偕兵部尚书退，兵部司官以俘交刑部司官械系出；鸣赞赞“齐班”，进行第三项流程。丹陛大乐作，诸臣工行三跪九叩庆贺礼，乐止，鸣鞭如初。皇帝起座，在金鼓铙歌声中乘舆还宫，百官皆退，盛典至此圆满结束。⑦ 宣宗有感而发，事后作诗一首，以资纪念，并命御书处制成墨刻赏赐在京

---

① 理藩院：《为随同解俘来京之伯克等在西华门外都虞司居住转传伯克等随带行礼并阿勒巴图到理藩院安置事致总管内务府衙门》，《内务府来文》，道光八年五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13-002-001752-0075。

② 兵部：《为知照钦天监择定举行献俘受俘典礼吉期凡有应行应办之处请一体遵办事致内务府》，《内务府来文》，道光八年四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13-002-001752-0070。

③ 兵部：《为举行献俘受俘典礼皇上御午门楼其楼座及门窗等处先期糊饰整齐事致内务府》，《内务府来文》，道光八年四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13-002-000130-0107；奉派办理午门受俘一切差事内务府堂主事福玲阿等：《为承领修理午门楼殿内天花等项活计用过工料银两事》，《内务府呈稿》，道光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08-006-000517-0060；《为咨请照例预备赐解俘官兵银币于受俘之翌日在午门前颁给事致内务府》，《内务府来文》，道光八年四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13-002-001752-0072。

④ 两翼前锋统领、八旗护军统领处：《为举行献俘大典皇上驾御午门楼受俘咨行将是日备差人员花名汉册咨送景运门档房以备按名查照放进事致内务府》，《内务府来文》，道光八年四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13-002-001752-0071。

⑤ 礼部：《为皇上御午门楼行受俘礼刊刷仪注事致内务府等》，《内务府来文》，道光八年四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13-002-000130-0108。

⑥ 礼部：《为皇上御午门楼行受俘礼按照仪注将乐悬仪仗全行陈设事致内务府》，《内务府来文》，道光八年五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13-002-000130-0137。

⑦ 参见曹振镛等：《平定回疆剿捦逆裔方略》卷 63，道光八年五月庚戌，清方略馆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编辑室整理：《清代方略全书》第 101 册，第 17-18 页；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礼部则例二种》（道光二十四年敕纂）第 3 册，卷 43《仪制清吏司》，“献俘受俘”，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277-279 页；礼部：《为皇上御午门楼行受俘礼刊刷仪注事致内务府等》，《内务府来文》，道光八年四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13-002-000130-0108。

王公百官及地方大员[①]：“迢迢万里欣生致，俯视渠凶面目真。驿送缧囚传月窟，诚孚大礼享明湮”。[②]

献俘受俘礼告成后，宣宗决定颁赏解俘将校。哈朗阿、诚端吉勒、通阿祥、云保四人各赏蟒缎朝衣料 1 件、纬帽 1 顶、缎靴 1 双，银 100 两，沿途护解官弁赏给江绸、银两有差，他们皆按军功从优议叙。普通满汉兵丁则赏银 20 两，每 4 名羊 1 只，每 2 名酒 1 瓶。[③] 随同解俘的回部伯克及“闲散回子”分别加升品级或赏给顶戴，[④] 并赐纬帽、纱补褂、纱蟒袍、缎靴、朝珠、江绸、荷包、银两等物。[⑤]

午门受俘后两天，即五月十四日，宣宗亲临圆明园廓然大公殿廷讯逆酋。他认为张格尔叛乱打破了乾隆朝平定大小和卓以来天山南北长达六十余年的稳定局面，造成清军将帅死伤，情罪重大，不容宽恕，著即行寸磔，枭首示众。特命“协办大学士尚书富俊、尚书明山、侍郎钟昌、奕经，前往监视行刑”，被叛军杀害的参赞大臣庆祥、领队大臣乌凌阿之子文辉、忠泰，著同往市曹观看，“并将该逆摘心，交文辉于伊父庆祥墓前致祭”。[⑥] 其对俘囚的残酷手段，较之乾隆四十一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居住于京师阜成门一带的包衣旗人穆齐贤在满文日记《闲窗录梦》中记录了相关见闻。是日晨，当他听说“叛回”将在宣武门外凌迟处死的消息，便和友人前往观刑，虽然最后未能赶上，但却在菜市口目睹了“张格尔之头置于木笼，正悬挂示众”的场景。[⑦] 此条史料，既可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旁证，又反映了当时的轰动效应。

清廷平定张格尔叛乱，巩固了乾隆朝用兵天山南北的成果，维护了边疆民族大一统，“申九伐之威，继十全之盛”，[⑧] 堪称宣宗在位期间的主要政绩。朝廷为此重举献俘受俘礼，时人论曰：“凡内地剿贼不献俘，惟外夷献俘，故惟康熙、雍正、乾隆间举行，而嘉庆朝无之。至是，万众争睹欢叹，诧为盛事。”[⑨] 然而，乾嘉以来内地起义不断，表明清朝的统治基础已经开始动摇，张格尔之乱的发生，又将边吏贪暴昏庸的弊病暴露无遗。[⑩] 伴随着清朝江河日下，其对边疆的控制力逐渐削弱。[⑪]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接踵而至，边疆危机空前严峻，割地赔款，国土沦丧，献俘受俘礼的辉煌终成往昔之回忆。

---

① 御书处官员等：《为呈明行取镌刻御笔御午门受俘礼成用志诗手卷所需石匠饭食银两材料事》，《内务府呈稿》，道光八年六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08-030-000333-0036。

② 《清宣宗御制诗》卷 33，《逆张格尔生致阙下，于五月十二日御午门受俘礼成，用志七言十二韵》，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 582 册，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269 页。

③ 军机处：《拟赏解俘大臣文武官员满汉兵丁等名单等》，《内务府来文》，道光八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13-002-001752-0089；《清宣宗实录》卷 136，道光八年五月庚戌。

④ 《清宣宗实录》卷 136，道光八年五月己酉。

⑤ 军机大臣曹振镛：《拟赏自喀什噶尔随同解俘进京伯克回子折》，《军机处录副奏折》，道光八年五月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202-4058-021。

⑥ 《清宣宗实录》卷 136，道光八年五月壬子。

⑦ 松筠（穆齐贤）记，赵令志、关康译编：《闲窗录梦译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48-49 页。

⑧ 南河总督张井：《奏为恩赐御制受俘礼成七宫十二韵墨刻一份谢恩事》，《宫中朱批奏折》，道光八年九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5-0045-003。

⑨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20《王文僖公事略》，第602页。按：自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起义始，清朝内地便动乱不断，至嘉庆年间酿成历时九年、波及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以及攻入皇宫的天理教起义。

⑩ 张格尔叛乱爆发的重要原因便是南疆地区吏治败坏。参见朱亚非、李瑶：《从张格尔叛乱看清朝边疆防御之得失》，《西域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⑪ 道光八年后，天山南北并未平静，动乱不止，直至同治三年（1864）浩罕国阿古柏入侵，新疆地区一度形成割据势力，这表明清廷对边疆的控制力已大不如前。参见王希隆：《张格尔之乱及其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 年第 3 期。

结语

本文通过梳理清代献俘受俘礼肇始、形成、兴盛、终结的发展脉络，可得出如下三点思考：

其一，清廷在边疆战事告蒇后举行献俘受俘礼，其目的是通过营造宏大森严的场面，惩治叛乱首领，达到宣扬国威、震慑边疆，以礼仪规训外藩的效果。雍正二年，裕亲王保泰等议行斯典时曾指出："历代出师凯旋，执获丑类献于庙、社，师行受俘之礼，所以正明叛逆之罪，彰天讨而重国法也。"① 清朝正是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乾隆朝纂修的《钦定日下旧闻考》一书中称："受俘献馘之礼行诸午门，所以钦鸿贶崇武功也。"② 意为举行午门受俘仪的目的乃彰显国家武功之盛。道光八年再平回疆，朝廷重举献俘盛典，地方督抚上奏恭贺，其中写道："于是我皇上申巽命，御午门，礼举受俘，勋昭耆定。以彰神佑，以快人心，以肃梗顽，以安疆圉"；③"启午门之壮丽，天子当阳瞻丙御之森严。大观在上，冥顽梗化，自贻膏鈇之诛。遐裔归诚，共仰垂衣之治"。④ 虽不乏溢美颂扬之词，却体现了斯典的政治功能所在。张格尔之乱中，有许多南疆回民从叛，因此宣宗特命回部伯克及所谓"闲散回子"随行解俘来京，参加献俘受俘礼，其杀一儆百、威慑群小的用意不言而喻。

其二，清廷制定完善献俘受俘礼，体现了其继承中华传统礼制，彰显王朝正统的政治意蕴。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受传统儒家"华夷之辨"观念的影响，曾被明末以来广大汉族士民视为夷狄，奋起抗争。因此，满洲统治者若要稳固其在中原的统治，势必调整政策，缓和满汉矛盾，消解民族对立。方法之一，便是继承儒家思想，遵循中华文化，塑造自身正统形象，彰显非汉族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以获得汉人尤其是士大夫们的支持和认同。在儒家体系中，礼文化位于核心地位，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因此，完善朝廷礼仪，便势在必行。古语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⑤"军礼"作为五礼之一，自然受到历代清帝重视，从康熙朝与用兵有关的仅有"命将出征仪""凯旋仪"两项⑥，至后世发展为"亲征""凯旋""命将出征""奏凯""受降""献俘受俘"六条目。⑦ 其中，"献俘受俘"尤为特殊。经笔者考察，除"大将受降"为清廷新创，⑧ 其余仪式在借鉴中原王朝典礼之余，均夹入了"拜天""抱见""诣堂子""祭旗纛"等颇具满洲文化因素的程序，唯有"献俘受俘"只是在明代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略微调整，⑨ 充分体现了清廷对传统王朝礼制的继承弘扬。⑩

---

① 《和硕裕亲王保泰等奏请献俘庙坛后行受俘之礼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2 册，第 852 页。

② 于敏中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卷 10《国朝宫室》，第 145 页。

③ 乌鲁木齐都统英惠：《奏为恩赏御制受俘礼成诗刻谢恩事》，《宫中朱批奏折》，道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0404-071。

④ 山东学政龚守正：《奏为恩赏午门受俘礼成用志御笔墨刻谢恩事》，《宫中朱批奏折》，道光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12-0403-099。

⑤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 2 册，中华书局，第 1981 年，第 861 页。

⑥ 《大清五朝会典》（康熙朝）卷 45《礼部六》，第 575-579 页。

⑦ 《清史稿》卷 90《礼九》，第 2657-2665 页。

⑧ "受降礼"历来为帝王举行，至清代则改为"大将受降"的形式。参见《宋史》卷 121《礼二十四》，"受降献俘"，第 2836-2840 页；《明史》卷 57《礼十一》，"受降"，第 1434 页；《清史稿》卷 90《礼九》，"受降"，第 2664 页。

⑨ 参见《明史》卷 57《礼十一》，"奏凯献俘"，第 1435-1436 页；《清史稿》卷 90《礼九》，"献俘受俘"，第 2664-2665 页。清廷对斯典的主要发展便是将"献俘""受俘"分为前后两日举行；取消"宣露布"的步骤；"跪奏请旨"的程序由刑部堂官改为兵部堂官进行。此外基本模仿明制，其文化内涵属于继承中华礼仪体系。

⑩ 清廷一方面弘扬儒家文化，继承中华礼仪，以塑造正统形象，获取汉族士大夫的认同；另一方面强调满洲礼仪，以保持民族特性，凸显民族意识，从而确立了独特的满、汉礼仪并行制度。邱源媛：《清前期宫廷礼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

其三，清前中期盛行献俘受俘礼，见证了诸帝践行边疆民族大一统事业的辉煌与艰辛。学界有观点认为，清王朝破除了秦汉以来以“华夷之辨”为内涵，以长城分界内外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大一统”观，形成了倡导“中外一家”“内外一体”的新型“大一统”观。① 正如世宗所言：“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② 高宗初平准噶尔后，曾命人将北疆山川道里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③ 在实践中，历代清帝通过武力征伐的方式，开疆拓土，最终形成“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④ 的局面。爬梳史料可知，清代献俘受俘礼正是为边疆战事而制作。同治年间平定太平天国起义，有人议行斯典，两宫皇太后便下谕表示：“其逆首李秀城（成）、洪芒（仁）达等，均系内地乱民，不必献俘”，⑤ “惟此等内地叛民，本与献俘之例不合”。⑥ 可见“内地剿贼不献俘，惟外夷献俘”的说法虽《会典》无载，然却是实情。⑦ 此外，献俘典礼必须在取得重大胜利，获得重要俘囚之后方可举行。乾隆十七年，四川提督岳钟琪剿灭杂谷土司，擒获首领苍旺，请旨献俘。高宗便明确指出：“苍旺不值献俘，即于军前正法”⑧。因此，笔者认为，清代前中期，尤其是乾隆年间献俘受俘礼的空前兴盛，正是边疆民族大一统事业深入发展，国家“版图日廓”⑨ 的真实写照。

References

Gao Zhiqun. “Xianfuli yanjiu”(A Study of Offering Captive Ritual). *Wenshi* (Literature and History) (35, 36) 1992.

Guo Xudong. “Jiagubuci suojian de shangdai xianjiexianfuli”(Etiquettes of Offering War Trophies and Captives Recorded in Oracle Inscriptions of the Shang Dynasty on Tortoise Shell). *Shixue jikan*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3) 2009.

Zhai Shengli. “Xizhou jinwen yu xianfuli”(Western-Zhou-Dynasty Bronze Wares with Inscriptions and the Offering Captive Ritual). *Wenwu chunqiu* (Cultural Relics and Annals) (6) 2010.

Gao Wenwen. “Tangdai xianfudi Luelun”(The Discuss of the Area Staged the Offering Captive Ritual in the Tang Dynasty). *Qianling wenhua yanjiu* (Qian Ling Cultural Research) 2010.

Zhou He. “Songdai xianfuli yuanyuan dibian shukao”(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about the Offering Captive Ritual in the Song Dynasty). *Yanandaxue xuebao* (Journal of Yanan University) (6) 2013.

Bi Xianglai. “Tangdai xianfuli yanjiu”(The Research of Offering War Trophies Ceremony in Tang Dynasty). Master’s thesis,Liaoning University, 2016.

Zhang Hong. “Beisong xianfuli yanjiu”(A Study of Offering Captive Ritual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Master’s

---

版社，2012 年，第 228-231 页。

① 关于这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参见李治亭：《论清代“大一统”与避暑山庄》，《社会科学战线》2003 年第 6 期；李治亭：《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社会科学辑刊》2006 年第 3 期；李治亭：《论清代边疆问题与国家“大一统”》，《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衣长春：《论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河北学刊》2012 年第 1 期等。

② 《清世宗实录》卷 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③ 《清高宗实录》卷 490，乾隆二十年六月壬子。

④ 《清世宗实录》卷 83，雍正七年七月丙午。

⑤ 《清穆宗实录》卷 107，同治三年六月戊戌。

⑥ 《清穆宗实录》卷 109，同治三年七月壬子。

⑦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 20《王文僖公事略》，第 602 页。此为清朝献俘礼制的独特之处，唐、宋、明代均有内战胜利而行斯典的记录。

⑧ 《清高宗实录》卷 423，乾隆十七年九月丁亥。

⑨ 《清史稿》卷 90《礼九》，“献俘受俘”，第 2665 页。

thesis, Liaoning University, 2016.

Bai Huai. “Wumen xianfuli”(The Offering Captive Ritual at the Meridian Gate). *Zijincheng* (Forbidden City) (3) 2005.

Hong Bo, lu Wei, Wu Pengxiu. “Qingchao qianlongshiqi zhanzheng de chuzhi he xiangli”(A Study of the Battle’s Disposition and the Ritual Accepting Surrender in the Qing Dynasty’s Qianlong Period). *Sheke zongheng* (Social Sciences Review) (7) 2012.

Xu Yanbin, Yuan Lihua. “Lidai lubu kao”(A Study of “Lubu” in Successive Dynasties). *Gansuzhengfaxueyuan xuebao* (Journal of Gansu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nstitute) (2) 2015.

Dai Yi. *Qinglongdi jiqi shidai*(Emperor Qianlong and His Period). Beijing: Zhongguorenmindaxue chubanshe, 2008.

Zhu Yafei, Li yao. “Cong zhanggeerpanluan kan qingchao bianjiangfangyu zhi deshi”(Gains and Losses of the Frontier Defense of the Qing Dynasty Viewing from the Jihangir’s Rebellion). *Xiyu yanjiu* (The Western Regions Studies) (1) 2006.

Wang Xilong. “Zhanggeerzhiluan jiqi yingxiang”(On Jihangir’s Rebellion and Its Influence).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3) 2012.

Qiu Yuanyuan. *Qingqianqi gongting liyue yanjiu*(The Court Rites and Music During the Early Qing). Beijing: Shehui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12.

Li Zhiting. “Qingdai minzu ‘dayitong’ guannian de shidaibiange”(On the Era Evolution of the United Multi-ethnic Identity in the Qing Dynasty). *Shehuikexue Jikan*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 2006.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he Offering and Receiving Captive Ritual in the Qing Dynasty

HUANG Shaohai(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1329465480@qq.com)

Abstract: The offering captive ritual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military rituals, which referred to a ceremonial activity of presenting captives or their heads to the Imperial Ancestral Temple, Altar of Land and Grain or to the emperor, after an army triumph.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achieved great military accomplishments, the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emperors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system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offering captive ritual. They added this system into the Huidian and held the ritual many times. In 1828, afte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Jihangir rebellion, the Emperor Daoguang held the offering and receiving captive ritual for the last time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offering and receiving captive ritual, which had the function of publicizing national prestige and deterring vassal states. It not only embodie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ritual system by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 of the dynasty’s legitimacy, but also witnessed the brilliance and hardship of the emperors in practicing the cause of the great unification to the border ethnic groups.

Keywords: the Qing Dynasty, offering and receiving captive ritual, military ritual, the great unification to the border ethnic groups